

第二章 棉纺织行业

第一节 历史沿革

天津棉纺织行业,是天津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、发展较早、基础较好的行业。

20世纪初,天津就已成为华北地区棉花最大的集散地,是中国棉花对外输出最多的口岸,又是棉纱、棉布进口的主要口岸。

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前,曾有过一个法兰绒厂,但已毁于义和团事件。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周学熙、凌福彭等在天津创办工业学堂和学习工场,开始有了机器织布工业。此后,在天津及周围的郊县陆续兴办了数十家机器织布工厂。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7),天津市已有9家织布工厂。1915年,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——北洋军阀政府官办的直隶模范纱厂在西窑洼开办,有纱锭1536枚,资本15万元,次年扩到5000锭,至1922年,天津华新、裕元、裕大、北洋、宝成等纱厂相继建办(1920年,直隶模范纱厂和恒源帆布公司合并,改为恒源纱厂)。6个纱厂,共有纱锭24.6万枚,布机760台,天津市还有单织厂87家,布机1821台。至此,天津就已成为中国北方棉纺织业的中心。1932年达生纱厂开工,有纱锭3400枚,1937年日资在天津又新建裕丰、上海、双喜、大康等纱厂。1940年,共有纱锭55.6万枚,布机20918台,原华资各厂均借日、美等资本,依赖举债起家,加之经营不善,市场萧条,重捐重税,负债累累,遂先后被日资兼并。裕元、华新两厂卖给日资钟渊公司,分别改名为公大六厂和公大七厂。裕大纱厂和宝成纱厂,先后于1933年和1935年转卖给日资东深拓殖会和伊藤忠商事会社合组为大福公司,改称天津纺绩公司(又称天津纱厂),大康纱厂后改为岸和田纱厂,除恒源、北洋、达生等少数几个民营厂以外,占全市85.33%的纱锭为日资所有,抗日战争后期,日军资源匮乏,拆毁近1/3的纱锭献铁军用,华北地区原棉供应也告断绝,一些棉纺厂都生产古棉纱(旧棉絮纱)和再生布,公大六厂部分厂房(棉纺二厂三纺场和一布场)为日军占用生产军火,天津纱厂曾拟生产酒精。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,仅存纱锭39.5万枚,布机19776台。日本投降后,原日资8个纱厂33万纱锭,9100台布机,由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接收(包括恒源、北洋和达生3家民营纱厂共有39.5万锭,包括单织厂共有布机7324台)。1946年,美棉大量进口,各纱厂又重新开工,但至1948年,国民党政府在军事、政治上的崩溃,经济上也不可收拾,美棉进口和国棉收购又告断绝,每周仅能维持开两三天,民营纱厂在1947年就停开12%纱锭,产量仅为1933年的33%,单织厂的开工也仅60%。

第二节 生产发展

天津解放后,原中纺一至六厂改为国营天津棉纺一至六厂,中纺七厂在1949年初部分厂房和设备焚于战火,火烧设备经整修后,分别迁到棉纺二、四两厂,该厂改为天津印染厂。1949年末,天津6个国营厂和3个私营厂共有纱锭36.9万枚,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4位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期,棉纺织行业也曾一度出现高指标的“大办、大搞”浮夸风,盲目追求高速度、高产值,导致产值产量虚高,质量下降,消耗增加,设备磨损严重。1960年以后的自然灾害,原料不足,导致各行业在下半年被迫停开部分机台。

1960~1962年,贯彻“调整、充实、巩固、提高”八字方针,将棉纺六厂调建材局改为玻璃纤维厂,纱锭分配棉纺一、四两厂,将恒源纱厂改为天津第一毛纺织厂,纱锭调三、五厂。春和、同华等织布厂调二机局发展电子行业,大新、色六等织布厂调纺织器材行业。同陞和、色五两织布厂成建制内迁河北和山西两省,棉纺一厂两个发电机组、恒源纱厂一个机组调河北省,一些布局不合理的分散织布生产点分别改作仓库、住房等其它用途,同时,淘汰约4000台老旧织机。至1962年底,全市纱锭由1957年的50.15万锭减至46.84万锭,布机由1957年的18400台减至11800台,这是建国后棉纺织行业发展的低潮,1962年全行业总产值仅为1957年的80%。经过贯彻“八字方针”后,棉纺织行业的生产形势逐步好转,并有了新的发展,1965年工业总产值比1962年增加了29%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部分企业有过短暂停产情况,生产起伏。1976年7月28日,天津遭地震影响,厂房、设备破坏比较严重,部分停产,棉纺二厂一纺场、棉纺四厂二布场重建,各级领导给予极大关怀和支持,生产得以很快恢复,当年棉纱产量比上年减少13%,棉布减少9.3%。1978年以后,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,中央为发展经济,改善人民生活,对国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”的方针,调整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,对轻纺工业实行了“六个优先”政策,通过调整转产,震损重建,撤队建厂(地震后新建住宅征地,安置农转工),在静海、宝坻、宁河、蓟县、汉沽区、李七庄、咸水沽等地分别筹建了7个新的棉纺织厂,共新增纱锭14.49万枚,市区内各老厂新增纱锭7.26万锭,全行业共增布机4279台。

天津市纺织行业,在建国以前,虽已具有一定规模,但设备陈旧,机型复杂,生产水平低,劳动强度大,劳动条件差。建国后,在迅速恢复生产的基础上,对遗留下来的旧设备进行了改造,20世纪50年代重点添置了空调除尘设备,采取安全保护措施,改善生产和劳动条件,推广了细纱断头吸棉装置,简化步纺工艺流程,推广清、梳、浆26项成熟的技术措施,以及郝建秀细纱挡车操作法,参加纺织部总结并推广了“五一”织布工作法和“五三”保全工作法。20世纪60年代,进行了锭子和牵伸部件的改造,推广了清花自动抓包机,落卷三自动装置,细纱半自动落纱插管机,三自动穿箱机等。70年代,推广了以“高速高效”大牵伸、大卷装”为中心的棉纺织33项配套技改措施,更新了30%的棉纺设备,布机向国产M型系列靠拢,为发展化纤产品和纯棉高档产品,增加了精梳机,也引进了部分自动络筒机和精梳机。20世纪80年代,重点是通过企业调整和各厂改造,新建了7座新厂,扩大了规模,更新了部分棉纺设备,增加了宽幅织机,从而改变了停留40多万锭的局面,设备状况、产品水平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观。建国初期,仅棉纺一厂有一套精梳机,发展到全行业有精梳机245台,按万锭占有精梳机台数为3.22台,全国各省、市除上海为3.68台之外,天津的精梳机比重